

近百年中日文化交流的 回顾与 21 世纪之展望

大连民族学院 关 捷 刘俊民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民族进步，文化发展，有自身的动力，也必须向他国学习。中日两国比邻而居，且有着两千多年的交流传统。特别是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持久而广泛，并且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深入和发展，这也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在世纪之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近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实态 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 努力把 21 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推向深入。

—

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为了便于论述，试将近百年来的历史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 即从 1840 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到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止。正如千余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所表现的那样，这一阶段仍然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只是学习内容有所转变，日本以中国为前车之鉴，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

第二阶段：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1868～1949 年）这期间 文化交流的形态发生了逆转 主要是中国学习日本。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 从 1868 年到 1895 年甲午

战争结束，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和迅速崛起，引起了中国朝野的极大关注、反思和警惕，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主动地学习日本；第二时期从 1896 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午战败后，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也有不少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推行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两国间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错综复杂。

第三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今。此阶段以 1972 年两国恢复邦交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 1949 年到 1972 年，是在无邦交状态下以民间为主的互相学习阶段；第二时期，1972 年至今，两国正式复交，人员往来不断增加，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互相学习和交流活动。

二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回顾近百年中日文化交流的经验和教训之前，先行概述一下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领先于日本，因而，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交流的领域十分广泛。早在秦汉以来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汉族人经过朝鲜半岛前往日本，被称为“归化人”，他们把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派留学生和留学僧来中国，专门学习唐代的典章制度、佛教、文学、建筑、技术、医学、历法、艺术、风俗等。回国后，在推进日本的政治、文化、佛教等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日本在接受的同时，又加以改造，并使其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唐代以后，虽然日本不再派遣留学人员到中国，但是由于航海技术的提高、经济发展的需要，中日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国的佛教、儒学、技术、文学、绘画、书籍、医药等方面都继续对日本产生着深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也学习了日本。唐人对于日本人的文化修养和各种技艺造诣就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不难想象，在交往中看到了日本人长处的中国人必然会受其影响。例如，在纺织物方面，明代已在仿制倭缎和日本的兜罗绒。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1853年美国人柏利率舰撞入东京湾，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关。相同的命运、千余年来的传统往来、地理上的接近，把两国进一步拉近了。清代后期，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仍然是日本向中国学习，但这时的学习明显地采取了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并且，往往是以中国为媒介学习西方。

鸦片战争，给日本朝野、中央幕府和地方藩主以巨大的震动，他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危机，并从到日本的中国商人、荷兰商人、返国的日本商人以及中国出版的新书中了解中国的情况。根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1844年，由中国商人提供的有关鸦片战争的“风说”书共有19件。^①日本人还根据风说书用日文撰写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著作和小说，如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长山贯的《清英战纪》等。这些书使日本上至幕府官员、藩主、各级武士，下至普通民众广泛了解了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日本人还从各种角度来分析、总结中国战败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他们认识到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清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武备不修，武器窳劣，文化脱离实际，从而开始批判地学习中国文化。同时，日本继续通过中国来了解外国情况。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介绍世界史地知识、探讨军备和海防的书籍流行于世。这些书便成了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重要启蒙读物。特别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海国图志》既是一部世界史地书，又是一部富有强烈政治性的海防全书。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近代西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宗教、科学技术等。该书传入日本后，立刻受到

日本人士的欢迎 仅从 1854 年至 1856 年间 日本刊行的各种版本就有 20 种之多。《海国图志》对日本开国和维新思想的形成，帮助日本人士扩大视野，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对敌情的了解，同时对日本开国论者战胜锁国论者，并促使一些锁国论者转而支持开国，使明治维新成为现实起了重要作用。此外，《数学启蒙》、《博物新编》等汉译西书传到日本之后，为日本掌握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851 年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日本影响也很大。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之兵乱（指太平天国革命——引者）与我国亦甚有关系，盼能派人前往调查”。^② 1862 年 德川幕府即借派遣“千岁丸”到中国贸易之机 带回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盾笔随闻录》、《金陵癸甲摭谈》、《天理要论》、《资政新篇》等。同行的长州藩士高杉晋作亲自记有《游清五录》。日本有关太平天国的各种书籍，大多反映出了日本幕末维新志士的忧国思想，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明治维新。

三

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曾引用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总结了中日文化交流史，认为可分正、反、合三个阶段。正的阶段是指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直至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本文已有介绍。反的阶段是指从 1868 年起直到 1949 年或者前后，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③

大家知道，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还根本谈不上发达，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反过来学习日本呢？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使然。中日两国都是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被迫打开国门，要么变革图强，要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中国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为“天时”（时代背景条件），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学习日本路

途近、省时省钱 信息交流迅速易通 此为“地利”。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字有共同之处，文化上有不少共同语言，比起西方有更多的感情联系 此为“人和”。下面 试以 1895 年甲午战争为界 分前后两个时期回顾一下这一“反”的阶段。

第一时期,1868~1895 年。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通过学习西方，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终于使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开始向外扩张。1874 年 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台湾 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 掠夺白银 50 万两。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 迅速崛起 不仅震动了腐败的清政府 也促使中国人开始注意了解、分析日本的近况 认真地反思 出现了一批评论日本明治维新的文章、著作。 1877 年 清政府派遣第一个赴日使团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已有人著文评价日本明治维新。如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和金安清的《东倭考》。自 1877 年中国在日本设立使领馆，不少官员和文人来到日本。其中的有识之士在认真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和《上清帝第一书》等 不胜枚举。这些著作 有的赞成日本明治维新中推行的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改革军制、实现军事的近代化的政策，但反对改革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有的则作了更深入的考察和思考，虽然也指出了日本社会存在的积弊，批评了其全盘欧化的流弊，但主要是认识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必要和成功，对日本在极短时期内取得的进步予以赞扬。从而给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启迪，促使他们去思考中国革新变法的道路。

如果说明治维新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崛起 那么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则强烈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视《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 感到痛心疾首。康有为曾在《上清

帝第三书》中大声疾呼：“日本内犯 致割地赔饷 此圣清二百年未有之大辱 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总结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他们认为，日本的胜利正是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从而认为中国“图保自存之策 舍变法外 别无他图。”^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维新派人物借鉴日本的经验，总结甲午战败的教训，决心向邻国日本学习变法。至此，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形态彻底逆转了过来。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逆转现象，也反映了文化交流受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变化的制约。

第二时期，1895～1949年。

1895年，以参赞官身份，随清朝第一次出使日本使团赴日的黄遵宪 历经八、九年写成的《日本国志》正式出版。这是中国近代一部深入系统研究日本的巨著，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中不仅对日本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介绍，而且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论。《日本国志》不仅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必备参考书，而且推动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康有为、光绪皇帝都读过此书。并且，维新变法的许多主张，甚至直接取自其中。黄遵宪在与日本友人笔谈中说：“仆之此书 期于有用。”^⑤所谓“学以致用”文化交流既是为了沟通联系，也是为了互补。《日本国志》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项中日文化交流的事业。其间，黄遵宪不仅深入日本社会加以实地考察，而且，从资料的收集到翻译都得到过日本朋友的帮助。

1898年中国的“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学习日本的最直接的事例。百日维新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十分重视研究和借鉴日本的明治维新。康有为曾编写《日本书目志》，梁启超作《记东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 特别强调中国维新变法应该“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康有为还把《日本变政考》呈光绪皇帝，书中叙述了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评论其利弊，提出中国

变法的建议。当然，百日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通过维新派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和介绍，把西方的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宣传，还是有价值的。

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各地。他们通过求学、结社、集会、翻译、出版书刊等各种方式介绍西学、开通民智。日本是中国留学生借以学习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对日本侵略的重要人物。

许多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者都曾留学和生活在日本，如廖仲恺、黄兴、宋教仁、秋瑾等。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他积极结交日本各界人士，联络同道，诸如宫崎寅藏等。一时之间，以推翻清廷、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为目的的政治团体，介绍革命的书籍、报刊，大量出现在日本。章太炎主办的《苏报》、陈天华的《革命军》、邹容的《猛回头》和《警世钟》影响都很大。社会主义学说最初主要是从日文进行译介，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先后五次被译成中文，广为流传。^⑥朱执信最早翻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片断，李达从日文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并在国内出版。

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首先是借用了日本的教材。1903 年，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作为中学教科书和一般大专程度参考书的《普通百科全书》共 100 册，日本中学教材几乎全被译介到中国。其次，部分留日学生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对传播近代文明、提高国民觉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不少日本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近代教育，虽然“日本教习”良莠不齐，日本人设立面向中国人的学校的动机各异，但是，客观上，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贡献，在传播近代科学文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大批日文书籍的汉译，不少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中，丰富

了汉语词汇。据我国语言学家的统计，汉语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词汇多达 800 余个，如文学、革命等词汇。引进或借用日语新词汇，丰富和活跃了汉语的表达能力。此外，中国近代的出版、印刷业也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综上所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是空前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清廷也向美国等国派遣过成批的留学生，交流也不少，但是都不及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中日两国两千年来的文化交流传统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对今天的中日交流有着启迪作用 发人深思。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起一次次侵略战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推行对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同时，施行文化侵略。日本从 1895 年到 1945 年统治台湾 50 年，1905~1945 年 统治旅大 40 年，1931~1945 年统治中国东北 14 年，使上述地区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其占领地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企图泯灭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校里禁止讲汉语 禁止中国教师向学生传授中华文明史 代之以“尊皇”、“一得一心”等殖民同化教育。从 1936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 1945 年战败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是百般摧残中国文化。但是，在此期间，日本正义人士坚持与中国友好，中日文化交流仍然不断，中日两国人民共同起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歌颂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流。

四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今 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合”的阶段 是中日两国互相学习的阶段。亦分两个时期论述。

第一时期，1949~1972 年。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2 年中日复交，由于战后世界长期处于东西对峙的格局中，中国和日本又分属于东西两大阵营 因此 长期以来 中日两国处

于无邦交状态下，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1949年10月到1952年5月，日本采取追随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中日交流基本处于断绝的状态。但是，两国人士的试探性接触不断，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对方，寻求重开中日交流的途径。1952年5月15日，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3人，冲破重重阻力，在参加完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之后，访问了中国，至此，封冻着中日交流的坚冰终于打破。之后，双方人员往来逐步增加，交流领域逐步扩展。尽管由于岸信介内阁的有意破坏，在1958年5月至1961年底，中日交流出现了一股恶流，中日关系全面断绝。但是，1961年底起，中日交流有了新的突破，后来发展为半官方关系。1962年《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在北京签字，作为双方政府接触的渠道，分别在北京、东京设立高崎达之助和廖承志贸易办事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扩展。

1972年复交之前，中日两国的交流主要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人员往来基本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1949年访问中国的日本人是6名，1949~1953年，没有中国人访问日本。而到了1956年，日本访问中国和中国访问日本的人数分别达到2425名和220名。^⑦随着人员往来的增加，文化交流活动也日趋活跃，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学术、出版物、广播、电影、新闻报道、书法、美术、音乐、戏剧、体育、宗教等。学术交流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医学、物理等，又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如法律、文学、历史等。举办书画展、电影展和体育比赛，以及戏剧团体的访问演出，交换常驻记者等，都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更加直接而便利的条件。

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下，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一些社会团体、民间机构来实现的。人员往来中，中国主要是由社会团体派出，日本则既有个人行为也有民间机构派出的团体。交流的具体形式，有参观、考察、出席国际会议等。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日

本“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等友好团体通过发表联合声明，签订文化交流计划的协议书等形式，推动和发展了中日民间在各个领域的文化交流。这期间的许多文化交流活动，都是在上述团体的组织、安排下进行的。此外，中国教育工会与日本教职员工会之间、中华全国体育代表团与日本体育界之间、中国科学院与日本学术团体之间等的行业工会和团体之间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

活动。

文化交流消除了两国人民之间的隔膜，促进了各方面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培养了友好人士。为中日复交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石。

第二时期 1972 年至今。1972 年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 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974 年 4 月签订了《航空运输协定》，1978 年 8 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3 年胡耀邦访问日本 中日双方确定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互相依赖”的中日关系四原则 并邀请 3000 名日本青年代表访问中国 还决定成立“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两国高层领导互访不断 民间交往更加深入和广泛。

邦交正常化，为两国文化交流敞开了大门。特别是 1979 年两国政府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后 出现了民间、政府、地方的交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可喜局面。交流的领域几乎涉及所有社会层面 可谓百花齐放、繁花似锦。

首先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 在双方政府的支持、帮助和组织下，出现了新的形式。例如，双方互派留学生，签订文化交流协定，两国政府各部门间的交流合作、领导人互访等，许多都是在双方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卓有成效。双方开展了诸如文物发掘和保护、科学合作研究、人才培养、环境保护等。其次 地方和民间交流也很活跃。城市间、省县间结成友好关系，大学间的校际交流等，

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大学、研究机构的交流，双方交换资料、互相学习、合作研究、参加学术讨论会、互赠图书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再次，围绕中日间的交流问题，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出版发表了不少富有成果的论文和著书。在中国，仅 1949~1993 年即出版译著 3529 册，发表文章 19465 篇。许多论著有独到的见解。日本出版的著作亦相当丰富，其中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编辑的《日中友好运动史》等书，则直接研究和探讨了中日文化交流问题。

在 1972 年中日复交之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都较以往有了巨大发展，仅从两国人民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的热潮中就可可见一斑。1998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说：“我深信，民间友好始终是维护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坚定力量。”^⑧文化交流尤其如此。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消除隔阂，是其他各项交流的润滑剂；文化交流可以培养友好人士，为保证中日关系健康顺利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比经济等领域的交流更加深入和持久。认识到文化交流的意义和作用，进一步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向前发展，仍然是今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

综观百余年来中日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情况，不难发现它受着双方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趋向区域化，政治格局呈多极化，新的国际秩序在酝酿中。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会影响两国的未来而且会影响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因此，在未来的 21 世纪，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加强合作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

的和平，在经济上可以优势互补，中日之间存在着相互协调、互通有无、共同繁荣的可能。面向 21 世纪，发展中日友好是两国共同的需要。但是，中日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历史认识和现实的问题，会不时地干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例如，侵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军事同盟、钓鱼岛问题等。进入 90 年代以来，日本有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主张在中日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可见，“中日友好”并不是喊口号就能实现的，而应该不断努力，拓宽交流渠道，加深了解，相互理解和信任，创造新的友好合作关系。文化交流也就会出现新的气象。

回顾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认识现状，展望 21 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应该更加广泛深入。中日两国人士应在坦诚相见的前提下，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和合作。在此，谨提出若干看法，与关心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人士探讨。

一要摆正态度，端正认识，互相尊重，坦诚相见。我们在看到对方优点的同时，应该认识到双方的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一，而且会出现双方的观点、理念、看法的差异。不要强加于人，要求同存异。对原则问题，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应理直气壮地坚持，不因怕伤感情而迁就。坦诚和友谊、彼此尊重是交流的纽带。要敢于正视历史，勇于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明白“和则两利，不和则俱损”的道理。

二要进一步扩大人员往来，相互接触，为加强文化交流创造条件。青年是 21 世纪文化交流的骨干，两国应该多派留学生。综观中日关系史，古代日本赴隋唐的留学生和 20 世纪初直至二三十年代中国赴日的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留学生是未来文化交流的使者和骨干。

三要拓宽交流渠道，提高交流的层次和质量。交流的目的不仅是学习和借鉴，还要努力把学习和借鉴来的东西融入到传统文化中，使之升华。为此，交流既要普及到广泛的群体中，又要使每

一项交流活动，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和周密的计划，做到真正有所收获，避免空洞化。政府要为这样的交流提供资金和政策上的方便。传媒界要大力推进和鼓励这种交流。我们知道，传媒起着传播信息、启发和指导民众、扶助文化发展的作用。因此，中日双方的媒体都应该多介绍对方的文化，宣传交流成果。诸如通过广播、报纸、电影、电视、展览、出版等手段加以推广，以使普通群众理解和接受。

四要积极开展和推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领域的合作与学术交流，并注重实效。诸如人员互访、互聘，建立校际交流，召开研讨会，互相提供资料，合作研究等。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限于经费等原因，不够深入，缺乏长期性和计划性。应该调动双方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拓宽交流层面，深化交流内容，还需要政府和经济界有识之士的支持和援助。

五要扩大中日双方图书出版事业的交流。诸如出版学术著作、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类读物、音像制品等。还应提供在对方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对于一些学术、文化方面的书籍、杂志，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通过在对方国家出版发行，或翻译为本国语言，直接输入等手段，介绍给双方的读者。出版物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

六要扩大交流领域。如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宗教等方面，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共同点很多，目前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待进一步扩展。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得到升华。21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大有可为。在世纪之交，这种交流已呈现出了很好的发展势头。如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合作项目，就开展得有声有色。中日双方，自上而下都十分重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并在积极探讨进一步扩大的渠道。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日文化交

流必将超越隋唐时的盛况。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注释：

森睦彦：《作为鸦片战争情报的唐风说书》见《法政史学》第 20 号。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 第 221 页。

季羨林：《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1 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戊戌变法》丛刊第 2 册 第 195 页。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见《中日文化与交流》第 3 辑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年 第 91 页。

⑥据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的统计 自 1660 年至 1978 年中译日文书 5765 种；日译中文书 3335 种。见《中国译日本书籍综合目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 第 38 页。

⑦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第 235 页。

⑧《江泽民出席日中友好团体招待会》载《光明日报》，1998 年 11 月 12 日。

世纪回眸： 清末中日文化交流与两国关系的考察

天津社会科学院 周启乾

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对于百年来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作一回顾，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无疑将有助于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构筑新型的两国关系，推动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

在 20 世纪中 中日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00~1945 年 继 19 世纪末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继续推行其大陆政策，在中国领土上争夺势力范围 相继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 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并终遭失败。(2)1945~1972 年 战后日本在东西方冷战中追随美国 缔结“日台条约”敌视 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3)1972 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 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限于篇幅，本文拟就 20 世纪初即清末中日文化交流与两国关系作一探讨。

—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一向以老大自居而实已衰朽的清帝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举国上下受到极大震动。以此为契机 有识之士瞩目于日本 提倡学习明治维新 并导致 1898

年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出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 年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称“泰西诸学之书 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吾因其成功而用之”；“费不千金而要书毕集”。^①他在进呈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介绍日本自明治元年至 23 年（1868~1890 年）发生的重要事件 尤其着眼于它的改革措施与政策 并以按语形式评论其利弊得失，还就中国应该如何仿效提出设想和建议。《日本变政考》的主要依据 即是日人指原安三编著的《明治政史》。此后，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诏书便大量参考甚至直接引用了《日本变政考》的内容。^②

短暂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日本。旅日期间，康、梁根据亲身感受依然把日本作为实现改革的样板。梁启超 1873~1929 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中分析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又撰《立宪法议》（1900）指出“今日之世界 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旧嬗代之时”，认为“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乃“理势所必至”如果企图以人力加以阻止 则犹“以卵投石 以蜉撼树”。他认定“日本得风气之先 趋善若渴 元气一立 遂以称强”；“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③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原有的统治体制再也难以继续维持。将变法维新运动镇压于血泊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统治的需要，同样认识到了实行改革的绝对必要。清廷于世纪初施行的所谓“新政”就其主要内容而言 依然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继续 效法日本立宪 已成多数人的共识 并提上议事日程。

与西方议会制政体相比，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清代统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于 1906 年奏称，“日本维新以来，一切政治取法欧洲 复斟酌于本国人情风俗之异同 以为措施之本”；“大抵日本立国之方 公议共之 臣民 政柄操之君上 民无不通之隐 君有独尊之权”。^④驻日公使杨枢更奏称 日本“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 然于中国先圣之道 仍遵守

而弗坠 是以国体不摇 有利无弊 ”,“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 最可仿效 ”。^⑤考察宪政大臣达寿于 1908 年上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 ” 同样指出“日本自幕府归政以来 书籍奉还 废藩置县 ”,知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存 ”只有“立宪可以固国本 ”才能“立于国际竞争之场 ”。^⑥他认为,日本能够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也 ”。^⑦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清政府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拟定了《宪法大纲》共计 23 条 其第一、二两条所称“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世一系 永远尊戴 ”和“君上神圣尊严 不可侵犯 ”^⑧即明显取自明治宪法。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1818~1891 年)已经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和引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经验 并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作了详细汇报 呼吁“急图内治 以立富强之基 ”。^⑨不过 中国开始和大量派遣留日学生 还是在甲午战后。

作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何以在战争中取胜?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去探寻其中的奥秘。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 年)在所撰《劝学篇》(1898)中分析其原因称,“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 率其徒百余人 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 雄视东方”。关于留学地点 他又将东西方加以比较 认为日本“路近费省 可多遣 ”,“去华近 易考察 ”,“东文近于中文 易通晓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与此同时 张之洞还指出 西方学术已经日本吸收消化,“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所以“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⑩